

主持人语

自 2008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欧洲不断面临各种危机的考验。在各种危机的冲击下，欧洲一体化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体化未来走向不确定因素增多。5 月 5 日，中国欧洲学会欧洲一体化史分会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联合举办主题为“危机连连：欧洲一体化诸问题及其背景”线上研讨会，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就欧盟及其成员国如何应对、化解各类危机，欧洲一体化在政治、经济、社会不同层面的发展情况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欧洲一体化史分会会长钱乘旦认为，欧洲一体化不是向超越民族国家这一方向发展，而是欧洲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互动方式。欧盟是“民族国家的行为共同体”，这种提法反映了欧盟的性质。在国际事务方面，欧盟给每个国家提供了协商的平台，通过某种机制达成行为共识。然而，就目前欧盟状况而言，各国有福可以共享，但是有难很难同当。特别是在三月欧洲成为疫情的“震中”时，不同国家无法达成应对疫情的共识就是典型的例子。

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沈雁南认为，二战后，欧洲国家建立欧共体只是采取了新的合作方式，包括今天的欧盟也是如此。这种合作并不是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欧罗巴国家。

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困境是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欧洲一体化的特征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是一体化巨大的阻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欧盟的成员国越来越多，差异越来越大；二是民粹主义抬头；三是发展动力不足。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陈晓律从版图问题、成员界定、如何应对复杂国际形势三个方面介绍了欧洲一体化的困境。他认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欧洲国家不应该保持消极态度，而是要积极地与大国开展合作，促进互利共赢。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雷建峰从科技革命的角度分析了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他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欧洲的步伐明显跟不上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节奏，加上科技、市场还有劳动力缺失，让欧洲迅速落后。随着美国和一些新兴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新发展，欧洲在全球竞争中的劣势更加突出，欧洲科技方面的削弱也导致了凝聚力的减弱。

虽然欧洲一体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专家学者均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冯仲平对欧盟的前景提出了三个可能。第一，一个双重的欧洲会出现。一部分欧洲国家会在一体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还有一部分国家可能会继续观察，等到一体化能够符合自己的利益时再加入。第二，自愿联盟。不同的国家会在不同的领域，根据自己不同的利益

形成结盟。第三，在没有巨大的变化下，每个国家可能会维持目前发展现状，而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文华认为，近年来欧盟成员国利益冲突加剧，给一体化进程带来巨大挫折，但不会导致一体化垮台。欧盟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状况，以及欧洲面临的不同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和现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国与国之间需要建立一个协商机制，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合作。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徐蓝表示，全球化步伐进一步深化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因此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取决于主权国家让渡，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张力。不同国家如何让渡、让渡哪些利益、让渡的接受程度将起到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需要重视的是如何构建一个可以保护国家主权、符合广大欧洲国家利益的框架。

《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表示，一体化使欧洲主要国家更加发达，给一些中小国家也提供了满足利益需求的平台，因此对一体化不应该持悲观态度。对世界而言，一个团结的欧洲不但稳定世界和平，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但是，今后欧洲在国际事务方面可能更倾向于走现实主义道路，虽然和大国间的合作不会停止，但会更加慎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陈志强表示，为了使欧盟走出危机，欧洲国家不光要关注利益，

同时也要从更深层次推动各国发展。德国对欧盟走出危机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法国的角色也非常关键。在未来，德国和法国的合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体化的走向。

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赵怀普认为，欧洲一体化不会完全陷入停滞状态。虽然多重危机与挑战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的发展造成了拖累，欧盟现有的实力包括一些制度的安排，以及广泛多领域共同政策和诸多灵活性的措施，使得欧盟仍然具有应对危机与挑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制度工具与政策手段。

“博雅工作坊”第32工作间

危机连连：欧洲一体化诸问题及其背景

2020年5月5日

本期工作坊由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室主任、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秘书长刘作奎主持。

欧洲一体化史分会会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发言中对欧盟/欧洲一体化的性质作出总结。他指出，过去许多表述，包括网络上的说法和欧洲人自己的宣传，都认为欧洲一体化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但实际上，欧洲一体化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互动方式，本质是民族国家的行为共同体。欧盟各国在各种事务中碰到诸多问题时，它们能够互相协商，能够通过某种机制来达成某种共同的行为共识，但并不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它们是在向最终建立一个新的欧罗巴国家的方向发展。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如果是真正的一家人，就应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这次疫情的种种事实暴露出，欧洲在面临如此巨大灾难的时候，还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给人的印象是有福可以共享，有难不能同当。

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沈雁南表示非常赞同钱乘旦教授对欧洲一体化的界定。他强调讨论欧洲一体化，必须对其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界定。他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国家在二战结束后所采取的

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合作方式，这是讨论该问题的前提。由此出发，他谈论了对当前欧洲一体化困境的三点认识：一是主要核心成员国（英国）的退出，这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双方还在谈判，但大局已定；二是欧债危机、经济危机和民粹主义等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实际上欧洲内部的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都有明确的表征，部分成员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国家相互抱团；三是欧盟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二战结束后其刚起步的时期完全不同。

近几十年来，苏联解体了，欧洲一体化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经济成就，德国已经融入了一体化，而当初那些刺激因素的改变，给欧洲一体化的下一阶段发展无疑带来了挑战。但沈雁南认为，欧洲一体化仍将继续发展，其理由有三：一是欧洲一体化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即这种合作方式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但其内容和形式可能都会有变化。一方面资本扩张的本性不会改变，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已经连成一片，很难分割，产业链也不会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内大多数国家恐怕还不能在国际舞台上独自行事，它们不会有明显地分裂，但可能会有碎片化的倾向，会有重新的组合，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二是成员国已经享受到一体化带来的经济好处，它们不会轻易改变；三是从以前的欧共体到现在的欧盟，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冲突，但它依旧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从历史上看，欧洲一体化就是在不断的冲击和不断的

调整中发展而来，只要基本的理念不变，它还是会在不断的争吵和不断的谈判中继续推进，但很可能会面临各种体制和权力结构管控方面的一些变化。

最后，沈雁南指出虽然疫情之下欧盟面临着许多问题，可能会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趋势，但对其作出分析和判断，应考虑欧洲各国在一体化中得到的好处和将要面临的困难这两方面。目前就其所得到的好处、所面临的困境和解决这些困境而言，欧盟恐怕还需维持它合作的一面，不会走向停滞或分裂，但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演变。

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的发言聚焦于欧洲一体化危机的出路。他认为，总体上说欧洲一体化确实遭遇到危机，这种危机不光是这次疫情，还包括整体经济下行，以及种种国际危机等。早在 20 年前，在当时国内普遍对欧洲发展特别是区域发展持乐观态度的环境下，他就已意识到欧洲一体化一定会遭遇现今所出现的问题，因为在当时只要涉及到主权让步的问题，所谓欧洲统一的问题就立刻会遭到挑战，国家间的问题马上会冲击这个体系。他也同意钱乘旦教授对欧洲一体化的定性，但他的界定更加消极，认为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大家可以在其中得到好处，但一旦发现所需的付出大于所得的好处，那么就会出现离心趋势。这种情况在以丹麦为代表的好几个国家中都已有表现，这次最特殊的是英国。然而，尽管危机连连，但陈志强教授对欧洲一体化总的看法仍是乐观的，发展区域

化符合全球化总趋势。

陈志强教授认为，在英国脱欧以及诸如意大利等国家威胁也要走脱欧道路的情况下，欧盟走出危机的关键所在就是德国的发展。德国一直是欧盟三架马车中拉主套的，是驾驶员，宛如定海神针，是整个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德国要想发挥好主心骨的作用，不仅要像现在这般不断出钱出力，还需要将许多利益让渡给其他小国。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还需考量德法两国之间的联手会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德国目前稳定的发展还能持续多久等诸多因素，虽然目标非常清楚，但是中间会有许多挫折。正如雷宗海先生的判断，“欧洲统一的时间表，要用 300 年时间来计算，目前在第一个最初的阶段还没有走出去。”陈志强教授强调这个阶段的主力军一定是德国，德国能否稳住，能否拿出新的欧洲统一方案，能否继续保持这个定力，都是关键所在。

陈志强教授指出，欧洲统一若想走出当前的危机，需要全方面摆脱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英国脱欧不是简单的利益问题，而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之间的冲突，这是由欧洲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与第一批先行崛起的国家相比，虽然欧洲大部分国家处在第二批，但他们在经济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各方面，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一种莱茵模式。人们有时会把欧洲视作铁板一块，这是一种误解。即便是发达国家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莱茵模式是许多欧洲国家这么多年保持稳定发展，始终走在欧洲前列的重要因

素。盎克鲁-撒克逊模式的特征是粗、大发展，而莱茵模式恰恰是发挥小、重，凝结集体力量的模式。这确实是欧洲的特殊情况，因为欧洲是全球仅有的在狭小空间里聚集了如此多实力相当的民族、种族、民族国家的区域，其冲突是全球其他地区少见的。在这种情况下，盎克鲁-撒克逊模式所倡导的大帝国模式（包括美国现在所推崇的），其实并不适用于欧洲。因此，陈志强教授认为，德国能否把莱茵模式真的变为欧洲未来发展的一个走向，是决定欧洲一体化最终走出危机的关键点。

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晓律教授围绕欧洲一体化的三个问题展开阐释。第一，欧洲的范围问题。他认为虽然欧洲的范围说起来好像是约定俗成的，但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地图上的欧洲是以乌拉尔山为界，乌拉尔山以西都是欧洲，这包括了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而现在谈论欧洲一体化，大家貌似都忘了它的地理界限。如果所谓的欧洲是把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么俄罗斯在欧洲地理界限内的那部分疆域算怎么一回事？但如果把俄罗斯算在欧洲之内，那么欧洲一体化是不是也要包括俄罗斯的这部分领土？如果包括进去，俄罗斯东边的亚洲部分又如何界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土耳其，它属于欧洲吗？还是仅仅靠近欧洲的部分算，而达达尼尔海峡以东的部分不算？如果把欧洲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分隔开来，那这个欧洲又应该怎么理解？陈晓律教授认为，这些问题都没有被认真研究，如果对欧洲

的范围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讨论欧洲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是存疑的。冷战之后，欧盟不断扩张，将东欧也囊括进来，但它始终没有表明扩张的意图，也没有说要不要将俄罗斯纳入进来，这都变得非常模糊。

第二，欧洲一体化的成员问题。他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对成员的身份都应有一个精准的界定或者是限制，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的限制，或者说这些成员国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条件，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土耳其在申请入盟的过程中就屡次遇到这一问题，土耳其的成员资格被限制，但欧盟又没有就其原因给出明确的说法。事实上，由于土耳其信奉伊斯兰教，且人口众多，一旦加入欧盟，整个欧洲一体化的权利结构就会发生巨大转变。此外，欧洲目前人口老龄化严重，各国原有的人口都在萎缩，大量移民涌入欧洲，此欧洲已不再是彼欧洲。因此，这些移民的身份认同就亟需解决。他们是认同他们的母国，还是认同欧洲的新国家，认同欧洲的基督教，还是认同自己原有国家的宗教。如果这些问题都没讨论清楚，就匆忙地谈欧洲一体化，那将是混乱的。

第三，欧洲一体化设计的初衷问题。欧洲一体化最初的目的是为在美苏冷战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防止欧洲国家内部开战，因此美国也出了不少力。德国为取得信任发起煤钢联营，将生产工艺完全公开，使其他国家不再担心德国崛起后会再次发动战争。可以说，无论欧洲一体化日后是否会走到更高层次，但其防止欧洲爆发大战的作用是卓有成效的，

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有很大的意义。但同时要实现经济上的完全一体化是困难的，大家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问题，只要合作互利，就能共赢，但千万不能过犹不及。目前欧洲面临的情况正是这个问题，发达的德国想成为欧洲的城市，逐步把其他较落后国家的产业吸收到国内，这导致如意大利这般此前拥有一套完整经济体系的国家，只能沦为单一依赖旅游业。

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从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欧洲一体化。她指出，全球史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于世界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提倡从全球整体出发来审视人类历史活动，而区域一体化是其中非常典型的领域，欧洲一体化则是核心区域。她认为全球史在理论上的最大突破是被认为从学理上颠覆了西欧中心论，或者说西方中心论，其在方法论上提倡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互动，更强调空间，总得来说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动、交融。据此，徐蓝教授提供了分析欧洲一体化的三重维度。

第一，将欧洲一体化置于二战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她看来，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从工业社会到现代化，其实就是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使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都可以相互获得最佳配置，而这种配置应是有序和有规则的。若国家间追求绝对利益，则会导致无序，甚至发生战争，二战便是一个例子。二战后，由于国际政治秩

序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全球化的发展相对有序，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逐步变成大的跨国公司，这使得全球化得以深化。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同步发展的，煤钢联营就是大的跨国公司。因此，这种深化是不可逆转的，且不仅是在经济上，还包括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可见欧洲一体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第二，将欧洲一体化放在整个欧洲的空间中，以整个欧洲作为其一体化进程的平台。这个平台在不断扩大，逐渐囊括欧洲的大部分空间。尽管英国脱欧，但欧洲一体化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即便在当年冷战大格局时期也在发展。在这个空间里，各国地理位置相近甚至相连，人文历史也很相似，国家之间利益相关太深，欧洲各国若要走回头路也并非易事。

第三，将欧洲所有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动、交融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个问题最为重要，因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之间一直在互动，也不断地在交融，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互动是不是真正平等，这种互动是否足够，以及它是否带来了各方面的交融。全球化促使每个民族国家都要适当让度国家主权以获得应有的回报，而欧洲一体化同样涉及民族国家主权的保护和让度，这就会引发矛盾。一体化的深化需要各国主权的深层次让度，但许多国家却强化主权保护，甚至民粹主义泛滥。民族国家和一体化之间的张力在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主权让渡应到何种程度才能使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且也能够

使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诸民族国家。

从全球化长时段来看，一体化在各国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换句话说，越富有的国家越希望推动全球化，获利也越多。今天像英国这样比较发达的国家，不想为欧盟中比较落后的国家承担义务，而相对落后的国家又无力自我拯救，因此一体化遭遇瓶颈。关键的问题还是一体化如何在深化国家发展的同时解决民族国家主权保护的问题。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几个原则：一是克服极端民族主义；二是实行政府主导；三是从各层次不同的机构来寻求妥协，找到国家主权和超国家一体化的结合点；四是实行灵活渐进，排除强制性一体化。这些既是一体化表现中的特点，也是欧洲一体化坚持发展的重要原因。当前解决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瓶颈，也应当遵循这些基本的原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研究员阐述了当前欧洲一体化困难重重的原因，以及其未来的前景。他指出，欧洲一体化一直是地区的试验，欧洲人一直在衡量究竟要让出多少主权，又能得到多少好处，这一过程越走越复杂，其 70 多年的尝试对世界其他地区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有人认为一体化出现了逆行发展，但其根本意义在于回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民族国家如何更好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为了和平与发展，民族国家需要深度合作，甚至需要分享部分主权。在全球化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背景下，欧洲一体化面临着更复杂的形势和更大的阻力，原因有三：第一，随着成员国

越来越多，它们在利益、政治、文化、地理、宗教上的差异，导致即使是功能性层面上的合作都举步维艰。欧洲许多人不认为它们会走到政治联合的阶段，因为阻力太大，利益优先。此次疫情爆发后，经济发达的北欧与欠发达的南欧之间矛盾很大，北欧不愿完全救助南欧，而南欧却觉得北欧应该援助。应该注意到，在欧盟东扩之后，欧洲一体化就没有太大的进展，因为这么多国家间的利益差距太大。

第二，民粹主义的兴起，这是欧洲一体化最大的敌人。民粹主义不仅不允许继续让渡主权，还试图将过去让渡的主权收回来。其崛起是由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2010 年的欧债危机，以及特别关键的难民危机，凸显出身份认同问题。这次疫情演变出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很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欧洲的民粹主义。

第三，欧洲一体化目前发展的动力不足。最初的动力是为了和平，为了德法不战，之后又为了与美国和亚洲几大经济体保持竞争，动力可以说较足。而现在的欧洲一体化，如果保持现状还行，但若想继续往下走就需要新的动力。当前新的动力正在酝酿，还没有形成全面的共识。而正在浮出水面的共识是中美对抗，即新两极格局出现的情况下，欧洲应处在什么位置，又如何保护自身利益，这很有可能会形成推动一体化新发展的新动力。现在欧洲许多重要的战略报告里都开始讲“战略自主”，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进一步联合，否则如何自主、如何与中国和美国对抗竞争都是新问

题。不过，新情况下还未真正形成新动力。

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冯仲平提到三种可能性：一是“双数欧洲”，即一部分国家先往前走，其他国家等一等，但等多久是未知数。这种模式不会被高调宣传，因为其必然会造成核心国和边缘国的区分，导致内部分裂（事实上已经出现相关情况，如防务一体化的问题）；二是“志愿者联盟”，即较小的国家与诸如德、法等大国在某一领域有共同的志愿和共同的利益，因而走向联合。其目的是实现欧洲合作，捍卫欧洲利益，以抗衡中国和美国；三是原地不动，维持现状。欧洲一体化发展至今，往下走或许很难，但要放弃现有的合作成果更难。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贾文华教授主要关注“欧盟是否会垮”，分享了许多相关的民调数据。他提到在以前“欧盟会不会垮”一般而言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进入欧盟的收益远大于留在外面，退出的成本也远高于预期加入的成本，或是留在其中的成本。然而，英国脱欧却真实发生了，并且近两年各方面的信息和数据也反映了这种趋势。首先是欧洲议会选举，主流党团、人民党团、社会党团整体控制的局面在下降，所谓的民粹政党控制的席位有明确的上升。此外，欧洲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欧盟消极看法的比例也在上升。例如，去年最有冲击力的是欧洲外交理事会在十四国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除西班牙外的其他国家，都有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欧盟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会垮掉。这份民

调中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惊奇的认知，即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成员国之间发生战争已经不再是完全超乎想象的事。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贾文华教授的团队对欧洲几个主要民调的数据作了初步的统计。2019年“欧洲晴雨表”民调中对欧盟持消极态度的比例比2018年上升了许多，大约达到40%左右。这意味着虽然欧盟整体上垮掉比较困难，但是一些不符合民众或者国家利益的安排很可能会慢慢退缩。以往的民调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中间有着一大片地带，从而保持两方或三方的均衡。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中间地带在逐步丧失，不是向两边分化，而是向消极的方面靠拢。不过，综合各类民调数据，整体上还是呈现积极趋势。比如欧洲社会调查最新一期的报告中，主流政党主张脱欧的选民比例不到14%，不主张脱欧的比例为86%，而民粹政党中主张脱欧的选民比例是31.07%，主张留欧的为68.93%，可见情况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认为支持民粹政党的就主张脱欧，或者是认为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政党都是持疑欧主义的立场。综合看，主张留欧的比例为81.2%，主张脱欧的为18.8%。

贾文华教授认为，总体来说，欧盟还未处于立刻要垮的危机中，但若想大踏步前进，则至少需要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更令人担心的是，欧盟是否会出现功能解体，即在目前已经形成的合作范畴中，是否有成员国退出，从而使这些合作名存实亡。因为对民调作进一步分解后会发现，那些主张

脱欧的人最不满的并不是针对一体化本身的认知，而是具体事务如难民问题、移民问题、以欧洲议会为代表的机构官僚体系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欧盟的确需要进行改革。

外交学院陈志瑞教授从“一体化”的概念、欧洲一体化的促进与现实、欧洲的疫情危机和“欧洲研究”的新方向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的语境中，“一体化”一定代表着不断联合统一的方向，因为中国有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但“一体化”更应理解为“整合”的概念。一体化并不代表着一定要走向更高、更深的方向，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民族国家利益的需求、整个欧洲对内对外利益的需求，对内部刺激以及对外部的关系进行整合。

陈志瑞教授指出，一方面我们仍然对欧洲一体化或是欧洲整合抱有某种理想。欧洲一体化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实现长久和平，二是为了欧洲自强，这两方面在今天看来都基本上得以实现。如果没有欧洲一体化，很难想象今日之欧洲会是如何，德国的野心恐怕也远不止如此。欧洲一体化提供了一种平台、一种框架、一种规制和约束，这都值得重视，因此应该对一体化的现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在现实问题上，欧洲战略自主或是出现欧洲壁垒，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日后将会面对更难打交道、更现实主义的欧洲。

陈志瑞教授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疫情是欧洲的新危机吗？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三场危机，分别是宪政危机、

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对应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目前国内外对疫情防控问题是否会导致地缘政治或权力转移存在着许多争论。他认为，尽管疫情会加剧欧洲很多方面的压力，但这些压力同样是中国、美国、非洲以及其他地方需要面对的，因此还需进一步冷静细致地观察和分析，不能仅凭确诊人数或死亡人数，就简单判断它们的疫情防控做得好不好，它们的制度是不是出了问题。例如意大利的病死率很高，这其实与它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欧洲文化传统、社交方式等等有着很大关系。

最后，陈志瑞教授介绍了“欧洲研究”的三个新方向：第一，加强历史方面的研究，如重新梳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研究欧洲各维度上的疆域演变，不仅是地缘政治和法律上的，还应包括文化、心理、情感等方面；第二，重视国际关系的角度，关注欧洲一体化内外环境的变化，如思考其动力是源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自主的需求。此外，欧洲一体化地区化和碎片化的问题也值得注意；第三，倡导跨学科的研究，以往学界把欧洲一体化作为特殊形态进行研究，但现在更应该将其解构和还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对政治欧洲、经济欧洲、社会欧洲、文化欧洲等层次展开研究，拓宽欧洲研究的眼界和研究问题的领域。

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赵怀普教授分享了他对欧洲一体化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对近年来欧洲防务合作的认识。关于当前欧洲形势，一方面，欧洲一体化受到了一系列

内部与外部危机的困扰和冲击，包括债务危机、经济危机、恐怖袭击、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以及当前新冠病毒危机。这些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短期内恐怕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在较长的时期内使欧盟陷入内部的反思与调整，包括改革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调整各种复杂的关系，以便维持欧盟团结和欧洲一体化的效率。与此同时，对外的欧洲大战略可能会变得更加内向，国际行动力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并不会完全陷入停滞状态，欧盟也不会在危机冲击下垮掉。因为欧盟现有的实力、制度安排、广泛多领域的共同政策、诸多灵活性的措施，使得它仍具有应对危机与挑战所需的物质基础、制度工具与政策手段。所以总体上看，欧洲一体化的步伐会放缓，欧盟的战略与政策会更趋于内向，但也不会无所作为，甚至在个别领域会取得进展，以维护欧洲一体化继续前行的动力，维持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捍卫欧盟存在的合法性。

赵怀普教授十分关注欧盟的防务合作。他提到“永久结构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简称 PESCO）是《里斯本条约》中唯一实质性的军事合作倡议，2017年年底 PESCO 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盟共同防务建设成为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热点，在国际上备受关注。

一方面，PESCO 作为欧盟在防务领域采取的战略举措，其目标对内是想通过整合成员国的军事资源以增强欧盟整

体的防务能力，以便能够有效地保障欧盟自身的战略利益，同时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对外则是为欧盟争取更多的独立和战略自主权。内生动力和外部压力共同构成了其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PESCO 启动至今，合作项目的数量从最初的 13 项增加到目前的 47 项，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也展现了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另一方面，PESCO 也存在局限性和一些问题。首先，启动的合作项目大多数属于难以实质上提升战斗能力的“软军事”项目，主要集中于联合训练和技术研发。这对于欧盟提升自身综合军力和战略自主权影响相对有限。其次，虽然 PESCO 强调合作程度的约束力，但仍然为参与合作的成员国留下了较大的灵活空间。具体而言，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意愿自行决定参加哪些合作项目，这导致了事实上参与每个项目国家的数量十分有限，只有三到七个国家参与了所有的 47 个项目。与之相应地还呈现出参与国分散且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参与项目较多的基本上都是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而那些传统上对于欧盟防务合作意愿较低的欧洲国家，仍然较少参与这些项目。这种情况显然会制约 PESCO 在现有防务资源上形成规模效应的能力，并且在成员国多元利益纠纷严重的情况下，其灵活性可能会严重影响决策的效率。因此，当前只是数量有限的参与国在一些比较边缘化的领域进行了有限的合作，且缺乏统筹，集中领导力不足。赵怀普教授认为，若想将此种防务能力转化

为欧盟可以实际利用的、付诸行动的对外军事行动能力，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这取决于成员国能否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使用防务能力等中心战略文化上形成更多共识。目前涉及此类有关协调成员国防务行动能力的合作项目数量还比较少。

PESCO 的外部影响因子或是外部阻力主要来自北约和美国的打压。美国仍需通过北约来维持在欧洲的驻军，以及对欧洲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并希望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军费来采购美国更多的武器。但欧洲许多国家有自己的想法，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明确表示，增加军费是为了建立自主的欧洲军费，而不是用于购买美国的军火。欧盟与美国和北约的矛盾就此突显，北约和美国对 PESCO 持有警惕，它们告诫欧盟，称 PESCO 应加强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军事能力，而不应是同北约竞争，或是建立一个北约的替代品。可见欧盟提高防务能力的举措必然会受到北约的阻挠，而欧盟恐怕也不敢直接挑战北约。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姜南重点谈了欧洲各国应对疫情举措的差异，以及各国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她观察到，疫情之下欧洲主要大国所呈现的民族性格差异很大，政府和民众对于疫情的应对政策和办法也非常不同。在德国，政府最初禁止 1000 人以上的聚会，德国人就举办 999 人参加的聚会，这迫使默克尔政府不得不对疫情的严重性进行重新定义，向民众强调新冠疫情是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面

临过的一次挑战，详细介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解释政府为何要采取这样的抗疫政策，以及保持社交距离对每个家庭的重要性等等。在英国，约翰逊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最初提出群体免疫，称英国 6666 万人中会有 3960 万人都感染上病毒，按照最低的死亡率来计算，大概有 118 万英国人将死于这次疫情，由此换取全体英国人实现群体免疫。鲍里斯在发布会上不仅不劝告英国人居家隔离，反而鼓励民众外出，号召大家主动感染新冠肺炎，因为 80% 的感染者其实都是轻症患者，不会有生命危险，痊愈后还能得到抗体，并称英国政府只对重症患者进行检测，轻症患者自己在家隔离七天，除非病情恶化。有意思的是，发布会的第二天，原本繁华拥挤的伦敦城一夜间变得门庭冷落，英国民众乖乖呆在家里。此外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形也各有特点，起初都不以为然，民众生性浪漫爱自由，进行居家隔离困难重重。

姜南认为，这些差异反映出欧洲各国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理念，以及政府不同的执政方式。如马克龙称法国的福利体系尤其是全民免费医疗体系，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和必不可少的优势，而这次全球大流行病显示出必须将某些财产和服务置于市场法则之外。德国则由于其经济实力强大、国人注重科学严谨和守规矩，以及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医疗体系，其民众在疫情中表现较为理性和冷静。相较而言，英国因为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民众并不总是听政府的，所以首相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用“群体免疫理论”让英国人做到

自我隔离。

关于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姜南指出，文化一体化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法国人不会觉得文化一体化就意味着法语的消失；英国人对自己的绅士风度和民主制度保有优越感；北欧人对自己的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政策感到自豪。这些都说明在语言文化和发展模式方面，各民族国家的自豪感和保护的决心都是很大的，包括本国的语言、选择何种道路、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福利模式等等。具体到这次疫情，从整个欧盟的角度来看，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如关闭边界、拦截防疫物资等。一直到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才公开向意大利道歉，为疫情初始阶段欧盟各成员国各自为政感到遗憾，并承诺欧盟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调配医疗资源，以及在经济援助上达成协议。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雷建锋的发言主题是“科技革命与欧洲一体化”，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近年来欧洲一体化遭遇挑战的原因；二是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欧洲一体化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二战以来欧洲的科技优势越来越弱，导致欧洲一体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变得较弱。二战虽然使欧洲许多地方沦为废墟，但欧洲科技实力的领先地位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此外，德国、法国这些国家的组织能力很强，这种科技优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最后十年。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日本和美国的挑战时，欧洲推出了统一大市场，大大减少了欧洲市场狭小的问题，

各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借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分析目前的欧洲，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某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也取决于这个民族自身的内部结构、自身的生产能力以及与外部交往的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不是现有生产力单纯量的扩大，都会影响分工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科技实力强，则生产力会得以发展，生产力发展，则向心力会增强。

当欧盟在经济和科技上比较强势时，欧洲人的信心、欧盟核心国家的信心、愿意加入欧盟的国家的信心也会大增，欧洲一体化的软权力也就比较强。例如欧盟宪法条约第一条写道，欧洲一体化的宗旨就是安全、扶持和扩展欧盟的价值。但在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欧盟的信心逐渐不足，原因在于欧盟在科技上的投入减少，市场总体狭小，以及高素质劳动力的缺少，这都导致欧盟经济发展依赖的基础科技实力受到很大影响。从具体数据看，2016年世界各国的科技投入，美国是5111亿美元，欧盟是3920亿美元，中国是4512亿美元。因此，由于欧盟在科技革命方面越来越弱，其凝聚力减弱也实属正常。

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雷建锋认为欧洲一体化尽管有国家主义和联邦主义之说，但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实用主义，因此判断欧洲一体化的标准应是其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不是

看其扩张得多大，是否遭遇了挫折。虽然欧洲一体化遇到很大挑战，但英国脱欧毕竟有很大的偶然性，人们不能将偶然事件完全视为必然，并按照必然的逻辑进行解释。总而言之，欧洲一体化最初发展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基础依然存在：如法、德等大国需要欧盟来保持其大国地位；统一大市场对欧洲各国都有好处；共同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因此，欧洲一体化将继续发展，但欧盟的国际地位将会越来越弱。

在讨论环节，与会者围绕民族国家与一体化之间的张力、新冠疫情对中欧关系的挑战、欧洲一体化的中美对抗背景等问题展开互动交流。

陈志强教授认为，新冠疫情不仅冲击欧洲，也具有全球性。这个重大事件之后，世界必定会发生变化，但目前我们由于还处在事件之中，对很多事情还未认识清楚，也无法看到结果，对未来的判断多是推测。总体上看，尽管欧洲一体化会遭遇很多挫折，但仍会向前推进，最终的目标还是会走向光明。欧洲是区域化的典型代表，其已经出现逐渐摆脱美国的势头。在中美对抗背景下，未来的欧洲不再会有过去“选边站”的冷战思维，必将会作出调整，但这仍需一个漫长的时期，才能化解当前危机。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受利益牵动，民族国家的形态还会强化，主权让渡到何种程度，恐怕在短时间内无法协商出结果。但是，德国的经济发展将是未来欧洲取得独立性的重要一步，因为德国的经济并不像美国

那般虚拟化和空心化，这也恰恰是能与中国形成良好合作的重要方面。

冯仲平研究员指出，中国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代表事件，因此今天许多人在谈去全球化时会认为是去中国化。中国崛起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对世界很多国家来说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件，欧洲、美国、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地区以及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受都不尽相同，应对的策略也不同。中国各界要重视这些不同的态度。美国的态度已经明朗化，民主、共和两党的核心共识就是中国不能超过甚至取代美国，不仅是特朗普政府，后特朗普时代也将会阻止中国的发展。至于欧洲，它们在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思考了很久，进退两难，最终在2019年3月12日给出了答案，认为与中国该合作还是要合作，该竞争也应拉下脸竞争，该对抗之处仍旧对抗。可见，欧洲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是比较现实主义、比较全面、较少情绪化和更加理性的。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新能源安全问题上可以合作，在高科技领域相互竞争，在体制治理模式上要与中国对抗。但无论如何，正如马克龙所言，只有欧洲进一步联合，才能够找到欧洲的自主性。

欧洲一体化史学分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孔田平指出，除前面所谈到的种种危机外，还应注意中东欧国家自己制造的危机，即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波兰相继走上所谓的“非自由民主”的道路，通过合法的方式，

取消、制衡和动摇法制。欧盟目前对于这种危机还未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它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的挑战。例如，新冠疫情在欧洲暴发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确保以法令治理的权力。波兰仍打算在5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并在众议院通过法律，规定由邮政部门和国有资产部来组织通讯投票，完全抛开选举委员会，尽管目前参议院还没有通过。孔田平不赞成用“非自由民主”来界定这一现象，而是倾向于称其为新的威权主义，或者是软性的威权主义，其对欧洲一体化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还需持续观察。

钱乘旦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一直以来，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一直是国内欧洲研究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背景下，欧洲各国如何应对此次疫情，未来欧洲将走向何方有着很深远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今天的研讨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参考，今后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欧洲一体化，通过不同时期不同的状态去分析才会有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评价。